

“延安作风”何以打败“西安作风”

□ 冯建政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党风问题，创造性地运用整风形式推动党的作风建设，明确提出并培育形成使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延安作风”，成功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最终“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养成一种新的风气

1935年，刚刚落脚陕北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承担起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面对极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国共产党要如何凝聚起全民族的磅礴之力，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任务？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基于对作风建设极端重要性的清醒认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大力倡导代表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新型作风。

1940年年初的一天，毛泽东应邀前往延安马列学院作报告，途中遇到特意前来迎接的4位同志，毛泽东严肃地对他们说：“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毛泽东从一件看似细微的小事入手，不仅精准区别了两种作风的根本不同，又明确指出了“延安作风”的强大战斗力。1940年3月，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回国，先后到重庆和延安考察，他深为国民党官场的腐朽景象所震惊，又被延安党政军民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折服：“那样简朴是我意想不到的，他们上下刻苦耐劳，努力求进

步精神，是值得称赞的”，由是判定国民党政权必败，“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着重打牢思想基础

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延安时期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成功解决党员思想入党问题，为“延安作风”的培育形成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延安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到延安去”，曾经是千万有志之士的共同愿望。诗人何其芳曾这样描述：“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这些爱国青年怀着对共产党的向往投入组织的怀抱，却并不了解党的性质和党的纲领，不了解怎样做一个合格共产党员，解决他们的思想入党问题成为巩固党的重要任务。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掀起了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学习运动。一位叫高鲁的鲁艺学员曾记录自己在1939年9月于行军途中完成的学习内容：读《中国启蒙运动史》《民族问题》《列宁主义概论》等理论著作，在野外听何干之、沙可夫的课各两次，参加一次军政测验和多次小组讨论。高鲁感叹：这确实是在战斗中学习，停下了就上课，这是中国共产党能成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主力的原因！

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作风问题，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党风”概念，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纠正错误思想，端正党的作风，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打扫房子”和“洗脸”。作为一场全党范围内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延安整风取得巨大成效，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黄炎培在其1946年所著《延安归来》中用“平凡”“务

实”形容当时的作风，称延安一切设施都切合一般的要求，不求好听听，绝对不唱高调。

密切联系群众

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延安作风”的培育形成指明了路径。延安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并完整论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系统形成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那么，共产党人又该如何将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毛泽东直截了当予以回答：“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以改善人民医疗卫生条件为例，陕甘宁边区婴儿死亡率一度高达60%以上。为了在文盲率90%以上的情况下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1944年7月，边区政府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妇女儿童卫生展览会，将妇婴卫生知识和造成婴儿死亡流产的原因画成图画、图表，内容现实且极具感染力和冲击力，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这一年，毛泽东向边区提出一村有一个接生员的倡议，号召边区政府大力培养妇幼卫生人员，推行新法接生，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美国学者马克·塞勒登认为，考虑到边区的实际情况，其在医疗卫生、教育和民间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实在了不起”。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证明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货真价实，带给边区人民安居乐业的新生活。在延安，人们常用鱼水关系比喻共产党与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对此却有更深一层的理解：“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共产党人因此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反腐倡廉、从严执纪

正风必须肃纪，延安时期的反腐

倡廉、从严执纪，为“延安作风”的培育形成提供了强大保障。毛泽东对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可能的腐败问题始终保持高度警觉，持续推动教育倡廉、立法保廉、执纪促廉。边区政府成立后，所有工作人员均无薪俸，只有微薄津贴，最高每月5元，各县县长每月2.5元，生活简朴蔚然成风。1940年陈嘉庚到访延安，毛泽东设“晚宴”欢迎，据《陈嘉庚回忆录》记载，“筵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置方桌上，已陈旧不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巾”。党的领袖“人民公仆”的真实形象在一位华侨的笔下得以生动再现。

边区政府曾出台一系列法规条例，其中包括大量反腐倡廉的内容。1941年5月1日批准实施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这条“从重治罪”的规定，彰显了党对腐败问题零容忍的决心。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多年的抗大第六大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不成，枪杀陕北公学学员刘茜，被判处死刑。毛泽东在致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1941年，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的老党员肖玉璧因贪污公款被处以极刑，引起极大震动。《解放日报》刊登的《从肖玉璧之死说起》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杂草生长！”在党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下，陕甘宁边区形成了“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



万隆会议：中国共产党国际领导力的“首秀”

□ 杜 兰

1955年4月，29个亚非国家代表齐聚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是新兴民族独立国家首次自主发起的国际盛会，更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转折点，并为新中国日后参与和引领全球南方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突破外交孤立战略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局势处于冷战对峙的紧张氛围中，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生政权采取孤立、封锁政策。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1949年新中国确立“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主要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双边关系。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非完全封闭的单向选择，新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与苏联的合作中也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提出了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1953年底，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次年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同两国正式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标志着新中国外交开始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迈进。

尽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但在国际社会中，新中国仍面临诸多误解与偏见，急需打破国际孤立，扩大外交空间。1954年12月，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

“求同存异”化解万隆困局

1955年4月18日，亚非29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会议，讨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幕式上，印尼总统苏加诺将会议定义为“世界历史的新起点”，强调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会议开始后，大多数代表在发言中都提出会议应当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有助于加强正常的经济合作，并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但分歧也随即显现：部分亲西方国家质疑共产主义威胁，中东国家纠结于宗教矛盾，等等。少数国家代表的发言更是偏离主题，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和攻击，会场气氛十分紧张，会议面临分裂的危机。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展现出卓越的外交智慧和风范。他临时决定将准备好的发言稿以书面形式散发，利用休会间隙重新起草补充发言提纲。在发言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他深

刻阐述了亚非国家间广泛的求同基础，就各国代表提及的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和颠覆活动问题等进行了逐一回应，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消除了各国对中国的误解。最后，周恩来热忱呼吁：“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短短18分钟的发言，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为会议找到了继续进行的正确方向，成为会议的转折点。

在后续几天的会议中，各国代表就会议决议和宣言的起草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如部分国家反对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宣言，会议一度陷入僵局。周恩来竭力化解矛盾，倡导会议尽可能表达出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共同愿望，抵制了将会议拖入思想意识论争的企图。最终，会议在友好、团结的氛围中顺利闭幕，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会议所确立的“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成为亚非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指导原则。

在为期7天的会议中，除了参加大小会议外，周恩来还在会外广泛结交亚非各国领导人，深入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和发展诉求，进一步阐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与实践价值。针对部分国家对中国边界问题的疑虑，中国主动提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在经济合作方面，中国倡导亚非国家加强经济技术交流，提出“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合作理念。万隆会议后，中国在4年内与10个亚非国家建交，开启了与亚非国家建交的高潮。

万隆会议重塑新中国外交的全球坐标

万隆会议为亚非国家提供了一个平等交流、协商合作的平台，对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和发展具有长远意义，开启了亚非国家联合自强的新篇章。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国代表团在促进达成友好谅解的决议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作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万隆会议见证了中国外交政策从被动到主动、从局限于意识形态到追求合作共赢的深刻转变，提升了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万隆会议后，中国外交从双边层面进一步迈向多边领域，开启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新局面。中国外交的重心开始向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倾斜，扩大了在第三世界的朋友圈。此后，中国一直将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基础，亚非国家也逐步成为支持中国外交行动的重要力量。

万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多边国际舞台上主导议程、展现领导力的标志性事件，为党的外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万隆会议上，党创造性地运用了国际统一战线论的思维和方法，团结广大亚非国家也成为“三个世界”理论的先声。万隆会议提出的加强亚非国家经济合作，也启发了中国后来推动南南合作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思路。

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看，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正是对万隆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万隆会议所倡导的万隆精神，也成为中国推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重要思想源泉，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自觉维护并始终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和优良传统。任弼时坚持以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为重，以革命事业为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推动党的团结统一，最终“使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达到新的团结统一”，堪称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典范。

推动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助力全党实现政治上的高度团结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迅速制定了集中力量向北进攻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却自恃兵强马壮，坚持南下川康，后公开进行反党分裂活动，并企图控制红二、红六军团。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了解到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后，身为两军团领导人的任弼时以“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为责，一方面坚决抵制张国焘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错误言论，抵制分化和吞并红二、红六军团的企图；另一方面以诚恳的态度同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进行深谈，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引导他们站稳正确立场。在整个斗争过程中，任弼时展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斗而不破，最后张国焘处境孤立，终于同意北上，避免了两支主力红军和党组织的分裂。

1937年11月，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的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对党中央在统一战线方面的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不尊重、不服从中央领导。此时，尽快廓清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认识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任弼时临危受命，远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一份长达一万五千字的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且还作了大量的补充和说明，使得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斗争策略以及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都有了更全面、更深入、更充分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予以信任和支持。这为此后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王明右倾错误和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进一步增进了全党在政治上的团结。

推动党的指导思想的最终确立,助力全党实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

延安时期，任弼时在实际的工作中发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比如个别党部或个人对中央不尊重、组织上闹独立性等。对此，任弼时认为不能简单把这些现象归结于不服从党的组织、党的决定，“而是深入到思想领域中去解决问题，去求得党内思想上的认识，因此要在党内普遍地进行教育，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为此，任弼时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后又针对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教育引导广大党员要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而对于主观主义对党对革命的危害，任弼时是有体会的，他以自己曾经执行“左”的错误路线的经验教训为例，引导广大党员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整风运动期间，任弼时多次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认识到在中央苏区时反对所谓“狭隘经验论”是错误的，指明毛泽东是“决定方向的人”，强调毛泽东的著作“对于党对中国人民确有极大的教育意义”。他号召全党同志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党的决定，并强调只有加强学习，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改进工作，进而巩固党。

此外，为彻底清除“左”倾教条主义，受党中央的委托，任弼时负责组织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协助毛泽东在总结历史中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任弼时拟了《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一九四四·五月）》，反复进行修改。同时他还召开座谈会收集意见，细致地向代表们和犯错误的干部做思想工作，并多次找王明谈话。通过历史决议的起草，促进了党内的思想团结，推动党员以史为鉴，积极纠正自身的思想错误。1945年4月，在任弼时等近5年的具体组织和筹

任弼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

□ 罗 舒

备下，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任弼时在开幕典礼上鲜明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标志着全党在思想上的成熟和统一，至此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推动党中央机构改革,助力全党实现行动上的高度一致

全面抗战时期，针对一些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中不协调问题，任弼时强调要建立健全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而应当是该地区党政军民统一的领导机关。主力军在该地区亦应当受当地最高党委的政治领导。在中央发布各个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后，任弼时所负责的西北局进行了模范推行，使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步调一致、行动统一，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执行，不仅增进党的团结，还形成抗战的合力。

任弼时非常重视从组织上加强中央对全党工作的领导。1941年7月，任弼时主持“改革中央组织机构委员会”，讨论中央各部委之组织编制和职能任务。8月，任弼时正式担任中央秘书长，积极完善中央秘书处的具体工作条例，同时还创建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使中央书记处的领导职能得到充分发挥。为实现统一集中、增强领导效能，1943年3月，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方案的报告，提出中央书记处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服从于政治局，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几天后，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明确中共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书记处在政治局决定的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这次中央机构的调整和精简，正式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实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领导，增强了领导效能，使全党在行动上更加一致。

